



真理报

第五期

8月31日2025年

马列毛主义将开辟通往革命的光辉道路！



消灭法西斯，自由
属于人民！

劳动解放社，中国马列毛协会报刊编辑小组

特别鸣谢：法国人民之火主席：张同志

毛

主

席

语

录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所加的
几段话》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时事评述

- ★ 资产阶级法权内的怒吼——评2025年台湾“大罢免”行动 1-4
- ★ 2025年上合峰会：帝国主义合谋下的伪国际主义盛会 5-7
- ★ 偶像崇拜如何麻痹阶级意识 —— 从马列毛主义看田中裕之网络爆红现象 8-11
- ★ 论2025年重庆大学城投影事件 12-14
- ★ 论江油事件 15-17

百家争鸣

- ★ 对中国不是修正主义这一视频的回应 18-20

不周山下

- ★ 新秘鲁 – 种族灭绝者迪娜·博卢阿尔特为武装部队、国家警察和辅助部队成员正式制定特赦法 21-22

历史文献

- ★ 共产主义原理 23



资产阶级法权内的怒吼——评2025年台湾“大罢免”行动

引言

2025年盛夏，台湾政坛爆发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大罢免”行动：31个选区同时发动对多名立法委员及官员的罢免投票，这是台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免浪潮。广大选民，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群众，以罕见的热情投入这场斗争，希望通过法律赋予的罢免权来惩戒反动保守的在野党立委。表面上，这是一次民主程序内的政治博弈；但从马列毛主义的视角来看，这更是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体制下阶级斗争的一次集中体现。这一自发的群众斗争，充分暴露了台湾现政权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性质，也展现了工农群众在资产阶级法权范围内反击反动势力的决心和局限。本文旨在从理论与历史的高度，对这场“大罢免”行动进行评论分析，揭示其中深刻的阶级内涵，批判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谬论，阐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群众路线、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对于这场斗争的指导意义。

台湾政权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本质

台湾当局自称实行“民主政治”，有多党竞争和定期选举。然而，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政治制度的实质取决于哪个阶级掌握政权。台湾的所谓民主，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在广大工农群众而言则是资产阶级对他们的统治和专政。历史上，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被人民革命推翻，新中国建立了由工农联盟主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国民党残余退居台湾后，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实行独裁统治，镇压进步力量，建立了对工农群众的资产阶级专政。即便1980年代末台湾开始所谓“民主化”，结束一党专制引入选举竞争，但统治阶级的性质从未改变——政权依旧控制在资产阶级手中，政治游戏的参与者也都是代表各派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无论是国民党这种传统保守派，还是民进党这样的本土资产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人民拥有的只是有限的、形式上的参与权利。选举、罢免等法律机制，看似给予群众一定发言机会，但实则设下重重关卡以保护统治阶级利益。在台湾，罢免公职人员需要经过高门槛的联署和投票率要求：发起罢免需获选区10%选民连署，同意罢免票不但要多于反对票，还必须达到选区总选民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否则即使多数赞成也无法通过。



这意味着资产阶级法律为罢免设下了苛刻的条件，平民百姓要运用此权利推翻一个在任政客极为不易。这种制度设计充分体现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资产阶级允许一定程度的“民主”，但随时确保对自己不利的群众行动难以成功，从而维持其对权力的垄断。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奉行的民主只是对人民实行专政、对反动派（即他们自己）实行民主的工具，而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则恰恰相反——“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对照台湾现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台湾现行政权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其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对工农群众则是专政和压迫。

“大罢免”兴起：群众反击反动势力

“大罢免”行动的爆发，绝非无缘无故，而是长期累积的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2024年底台湾立法机构选举中，反对党中国国民党（KMT）意外获得52席，与亲蓝的台湾民众党结成联盟掌控了立法院多数。民进党政府在立法部门陷入“朝小野大”（执政党少数、在野党多数）的困境。国民党及其盟友上台伊始，便急于扩张立法权、掣肘新政府预算，对民进党籍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提出的2025年度预算大砍特砍，冻结或删减了高达2075亿新台币的支出。这些删减不但针对赖政府在国防上的投入（如削减约31亿美元国防经费，引发国际关注），更波及许多民生领域，如原住民委员会预算和农业补贴等。国民党的保守反动作为激起了广泛民怨：许多原本支持国民党的基层群众（包括农民和原住民群体）也因自身利益受损而愤怒。可以说，国民党在立法机关的恣意妄为，引发了各阶层劳动群众的强烈不满，酝酿着一次对反动势力的自发反击。

今年年初开始，台湾各地的民间团体和草根组织陆续发起对多名国民党籍立委的罢免连署。这些发起者并非执政党直接操纵，而主要是出于群众自发：被冻结预算而受害的群体、对在野党阻挠改革失望的公民纷纷走上街头，利用法律赋予的武器表达抗议。短短几个月内，连署风潮席卷全台，总计31个选区达到门槛，触发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罢免投票。第一波投票在7月26日对24名立委和新竹市长高虹安（民进党籍）进行，第二波8月23日对余下7名立委进行。如此大范围、同步地对立法机构三分之一席次发动罢免，在台湾乃至世界民主政治史上都极为罕见。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公审”行动，充分体现了群众的不满与怒火：面对反动政客的倒行逆施，工农群众选择在资产阶级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奋起抗争，试图通过罢免来惩治一批亲资本、反人民的保守势力代表。

为了动员社会支持，罢免发起方打出了“抗中保台”（抗击中共、保卫台湾）的口号，将许多国民党立委描绘为“亲中卖台”的代理人。这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宣传，一方面反映出部分群众对国民党亲北京立场的警惕（例如有国民党立委在台海紧张局势中访问大陆，引发众怒）；但另一方面，这种以民族对立替代阶级分析的论调，也使罢免运动带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烙印。民进党执政当局见势迅速介入，党主席赖清德公开表示民进党“必须与公民力量同行”，动员全党为罢免助势。在执政党加持下，罢免方组织了盛大的“护国大绕境”等街头活动，把国民党描摹成“中共代理人”、仿佛不罢免就会危及国家安危。不可否认，这些宣传提高了部分选民的参与积极性，将对反动派经济政治议题的不满上升为捍卫“台湾前途”的正义斗争。但从阶级斗争观点审视，这种路线也有局限：它模糊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国民党被罢免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代表的大资本、大地主利益与人民利益相冲突，而不单是“亲中”或统独立场的问题。工农群众的正当愤怒在一定程度上被引导至民族主义轨道，这是值得革命者警惕的问题，我们在下文还将讨论。无论如何，“大罢免”浪潮本质上是台湾劳动人民忍无可忍、奋起向反动保守势力讨还公道的一次斗争实践，是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民主框架内的一次火山式爆发。

资产阶级民主框架下斗争的限制

这场席卷全台的“大罢免”，展示了群众斗争的力量，但其进程和结果也凸显出现行资产阶级民主框架对人民斗争的种种限制。首先，正如前文所述，法律门槛就是横亘在群众面前的第一道高墙。罢免投票不仅需要25%以上选民投下同意票且多于不同意票方可成立，还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复杂的联署和宣传动员。这对于缺乏资本和媒介优势的草根力量而言，是极大的挑战。尽管此次罢免方的组织动员已相当出色，许多选区投票率甚至超过五成之高，远超以往罢免案，但最终仍无一席成功被罢免。7月26日首波24席立委加1市长的投票结果揭晓：所有被罢免对象全数保住职位，没有任何一位被拉下马。8月23日第二波7席立委的罢免同样宣告失败。人民群众以选票对反动派的总攻遭遇了制度性挫折。

分析失败原因，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进行了有力的反扑和自我保护。一方面，国民党等蓝营势力充分利用他们长期经营的组织网络和政治资源进行反罢免动员：基层里长、地方派系、宗亲关系悉数登场，苦口婆心劝说支持者出来投反对票；一些深耕地方多年的政治人物（如花莲的傅崐萁）凭借雄厚人脉，轻松动员到与上次得票相当的反对票数，令罢免难以撼动其根基。另一方面，反动派还祭出收买人心的民粹手段，企图转移视线、瓦解罢免力量。国民党在立法院临时抛出“还假于民”（增加假日）、“还税于民”（普发现金）等迎合民生的小惠政策，试图以糖衣炮弹稳住民心。更有甚者，一些亲蓝媒体大肆渲染罢免运动造成“社会对立”“内耗”，恐吓选民不要让台湾陷入持续纷扰。这些手段综合作用，使相当一部分中间选民选择观望或干脆投下反对票。以至于某些被视为罢免方志在必得的目标人物，最终都有惊无险过关：例如“仇恨值”最高的台北市立委徐巧芯，罢免同意票虽高达6.26万张，但不同意票达到7.54万张，依然以差距不小的优势否决罢免。又如新北市立委叶元之，一度同意票与不同意票只相差百余张，最后反对票仍略胜一筹，险险保住席位。这些结果表明，在资产阶级民主游戏中，反动势力具备天然的守势优势：只要他们动员出相当比例的基本盘选民投票反对，罢免就很难逾越法律的高门槛而成功。更值得注意的是，罢免失败后，反动政客们立刻摆出一副趾高气扬、反攻倒算的嘴脸，急于给这场群众斗争定性泼污、水泼冷水。台北市立委徐巧芯在逃过罢免后，立即在社交媒体发文将此次罢免抨击为“大恶罢”，叫嚣“终于结束了”，并质问赖清德当局“准备开始好好做事了没？要停止斗争了没？”言下之意，罢免运动在她眼中是执政党煽动的“恶斗”，如今应当偃旗息鼓，让反对派安安心心过日子！花莲的傅崐萁则公然要求赖清德“坐下来和朝野谈”，一起谋求台湾“稳定走下去，为2300万人谋福祉”。表面听来，这是呼吁朝野和解、共商国是，实则是变相要求民进党当局放弃斗争、与反动派分享权力。这种论调无非是要把人民群众汹涌的斗争热情引向妥协沉默，把已经撕开的阶级裂口重新用“和谐”去缝合——当然，缝合的前提是保障反动派的既得利益不受进一步冲击。可以想见，如果执政党和群众真按反动派的剧本行事，那么此前的大罢免运动就可能前功尽弃，反动势力不仅稳固阵地，甚至会变本加厉反扑群众、报复进步力量。



事实再次证明：在资产阶级民主框架内，人民对反动派的斗争将遭遇重重掣肘。资产阶级法律程序、金钱权势的影响以及舆论操纵，都是反动阶级用来对付群众运动的武器。纵使有再大的民愤，如果不能突破旧框架，就难以从根本上撼动统治阶级的统治。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群众斗争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大罢免过程中广大群众表现出的积极性和斗争性，充分说明人民并非任人宰割的羔羊。一些反动立委虽保住了位置，但其反对票较选举时明显下降，甚至有7名立委的罢免同意票已超过选区总选民数的25%，达到了法定门槛却只因反对票略多而功亏一篑。这意味着相当数量的选民对这些人极度不信任、不满，只是由于制度设计和现实力量对比一时未能把他们拉下马。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次斗争虽遭遇挫折，但透过表象，我们已能看到台湾社会阶级力量的新对比：昔日国民党在一些传统盘据区一呼百应、票若泰山压顶的局面开始动摇，工农群众的觉醒让反动派寝食难安。换言之，阶级斗争的火焰已经点燃。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向和策略，这火焰终将烧破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藩篱。

反对修正主义歪风，坚守革命路线

“大罢免”折戟之后，各种“息事宁人”“改良妥协”的杂音开始出现。一些资产阶级政客和改良主义论调宣称，罢免争斗“撕裂社会”“危害民主”，主张蓝绿两党权力分享、合作治理，以避免“内耗”。还有人鼓吹所谓“和平演变”“议会道路”，仿佛只要通过选举轮替和渐进改革，不需要激烈的阶级斗争也能实现社会进步。所有这些声音，本质上都是在为反动派喘息和死灰复燃创造条件，其作用是否定群众斗争、瓦解群众斗志。我们必须擦亮眼睛，坚决识破和批判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牢牢坚持毛泽东指引的革命方向。

让我们逐一看看这些错误思潮：

- “和平演变”论：鼓吹阶级矛盾可以通过时间和制度自我调节来化解，甚至幻想资产阶级政权会自动向人民让步演变。这种观点否认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尖锐性，是对资产阶级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台湾，有人寄希望于培养“理性公民社会”来慢慢抚平蓝绿冲突、缩小贫富差距，但资产阶级不会因为说理就放弃特权。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鼓吹和平演变，结果是苏联东欧的惨痛教训；同样道理，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寄望和平改良，只会让反动派暗度陈仓、巩固统治。



- “议会道路”论：鼓吹通过选举、议会斗争即可实现根本社会变革，否定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在台湾环境下，一些改良派希望通过选票淘汰反动派，比如指望2028年下一次“大选”翻盘，而不赞成群众开展激烈斗争。然而正如此次大罢免所示，选举政治受金权操控，制度框架掣肘重重，根本无法充分表达民意，更无法触动统治根基。列宁早就指出，资产阶级议会是“为阻碍人民行使民主而设置的机器”，无产阶级不能把解放希望寄托在议会会议桌上。离开群众革命运动，仅靠选举游戏，是走不出资产阶级统治魔掌的。
- “权力分享”论：鼓吹阶级妥协，主张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合作”以实现稳定。这看似中立超脱，实则要求人民放弃诉求，与压迫者讲“和气”。傅崐萁要求赖清德当局与在野党坐下来合作，就是典型的“权力分享”主张。如果接受了，那无异于让刚刚发动斗争的群众缴械投降，让反动派以和平手段达到斗争失败才能做到的目的。这种路线实质是代替资产阶级向人民宣布：“不要斗争，一切照旧”。毛主席教导我们：“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历史上的进步从来都是斗争出来的，而不是谈判施舍来的。权力分享只会换来人民利益的进一步让渡和流失，绝非真正的长久安定。

针对以上种种修正主义歪风，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毛主席反复告诫：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任何时候，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劳动大众和剥削阶级的矛盾，人民大众争取解放的斗争一刻也不能停息。台湾的大罢免恰恰说明，即使在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并不会因为选票游戏而消失，反而会在特定条件下尖锐爆发。我们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这次罢免运动中群众表现出的革命积极性，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此次发动罢免的公民团体和基层群众，在没有强有力政党号召的情况下自主联合作战，创造了罢免联署31比0全面推进二阶段的“奇迹”。这表明台湾工农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引导他们从斗争实践中提高觉悟：认识到国民党等反动派的反人民本质，不仅在于其“亲中”或党派之争，更根源于其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与人民利益水火不容；认识到民进党等改良派虽然与国民党有矛盾，但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方面与之并无本质区别，当群众斗争危及整个统治阶级时，他们也会选择后退或妥协。因此，台湾劳动人民最终的解放，还需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建立自己的先锋队政党和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对解决台湾现实问题具有直接指导意义。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对占人民大众绝大多数实行民主，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换言之，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剥夺反动派危害人民的权利。设想一下：如果台湾实现了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权，那些亲美、亲日也好，亲大陆也罢，但凡损害人民利益、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政客，根本不可能握有立法权和话语权；一旦他们企图兴风作浪，人民有权立即将其罢免、依法惩办，而不必受到资产阶级法律苛刻门槛的限制。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之下，广大群众才能真正行使民主权利，监督和罢免官员不再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反观当下，在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体制下，一小撮政客财阀左右国政，人民纵有不满也难以通过制度内手段彻底纠偏。这种制度性的弊端，只有通过革命打碎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才能根除。台湾工农群众要避免掉入“和平演变”

“议会道路”“权力分享”这些温情陷阱，就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坚持人民立场，将斗争锋芒始终对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不被任何修正主义论调所迷惑动摇。

结语

2025年的台湾“大罢免”行动，是岛内阶级斗争的一次重要体现。尽管罢免结果未能如愿，没有一位反动立委被立刻拉下马，但这场斗争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人民群众已经觉醒并勇于运用斗争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大罢免摧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民意基础牢不可破”的神话，曝露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人民民主权利的虚假性和统治阶级的顽固本质。它警示我们：不论资产阶级如何鼓吹民主，当人民真正尝试行使民主权利挑战既得利益时，迎来的多半是失败的阻挠和冷酷的嘲讽。这更加印证了毛泽东的论断：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另一种形式。

然而，大罢免也向世界宣告：星火已燃，真理不熄。台湾的工人、农民和进步公民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他们亲身体会到，仅靠选票和制度内改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寻求更彻底的变革道路。这场斗争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将化作日后革命前进的养分。工农群众将认识得更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什么是人民民主，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可以预见，随着阶级矛盾深化，未来台湾社会的政治风暴还将继续酝酿。斗争也许会有反复，但历史前进的大方向不可逆转。

革命导师列宁曾告诫我们：“往往经过失败而前进”。此次罢免运动的挫败，正是为了日后更大成功做准备。只要我们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立场，坚决走群众路线，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干扰，台湾乃至整个中国的劳动大众最终必将挣脱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枷锁。那时，真正属于人民的民主制度将在宝岛上建立，过去横行霸道的反动派必定如秋叶般纷纷坠地。人民群众历史创造者的豪情一旦迸发，没有任何反动势力能够阻挡！正如毛主席所言：“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大罢免的滚滚风雷已经揭示出他们色厉内荏的本质。让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更大规模的人民斗争必将蓬勃兴起，埋葬一切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工农大众一定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翻身新天地！革命前途，光芒万丈，胜利必将属于坚持斗争的人民！



2025年上合峰会：帝国主义合谋下的伪国际主义盛会

引言

2025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峰会在中国天津召开，规模号称史上之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高调宣称，要“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然而，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出发审视，这场峰会并非什么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合作盛会，而是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为划分势力范围、争夺资源和维持自身霸权稳定服务的工具。这一多边平台聚集的各国（如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朗等），打着“反霸权”“多极化”的旗号，却行着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之实，其所谓国际主义不过是现代大国沙文主义和假国际主义的翻版。正如毛泽东所警示的，那些抱持大国主义的人“只顾本国的利益，不顾人家”。在引言中，我们点明上合峰会的阶级实质；接下来，将分层论述峰会中各主要国家的表现策略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动机，剖析如何混淆民族解放与大国扩张、篡改真正国际主义的真理；最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指出真正的国际主义道路。

上合峰会的阶级本质：帝国主义多边工具

上合组织峰会乍看是亚欧各国合作反霸的平台，实际上它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和若干区域强国的一种联盟和妥协。自上合组织2001年成立以来，它主要受中国主导，而俄罗斯则借此维持其在中亚的影响力。峰会的成员和参与者涵盖了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国、地区强权及自称“反西方”的政权：既有中国和俄罗斯这样有全球野心的帝国主义势力，也包括印度这样的区域性大国，以及伊朗、白俄罗斯等与西方对立的国家。这样的组成决定了上合峰会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博弈的平台——它最初就被视为在中亚制衡美国影响的工具。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要么通过战争重新瓜分世界，要么通过协议瓜分势力范围和资源。上合峰会正是后一种形式的体现：各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坐在一起，为了共同瓜分、重组世界的利益版图服务。正如毛主义者指出的，上合组织通过定期峰会和联合军演，使中俄达成了针对西方的集体战略协议，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由中俄主导的“东方版北约”。这一组织早已公开支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等对外经济扩张战略。换言之，上合峰会并非超越国家利害的国际团结，而是帝国主义集团为强化自身经济、军事盟约所进行的合谋与分工。

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这些国家在上合峰会上的合作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功利性：它们一方面高喊多边合作，另一方面也在建立由自己主导的规则和机构来抗衡西方主导的旧秩序。例如，中国借此次峰会大力鼓吹成立上合开发银行、推动关键矿产资源开采融资等议题，

试图以金融手段编织自身势力圈，挑战美元霸权。同时，各成员在安全上互为后盾，举行联合军演，声称打击“三股势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实际上往往成为镇压各自国内民族解放运动和巩固专制统治的便利借口。这些都证明，上合峰会并不代表各国人民的利益，而是代表各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它服务于维护现存帝国主义体系的稳定，充当帝国主义“大博弈”的多边工具。

各国策略透视：反霸口号下的大国角逐

在2025年天津峰会上，各主要参与国各怀心思，皆以自身资产阶级和大国利益为依归，其表现充分体现了“混淆民族解放与大国扩张”的修正主义套路。

中国：作为东道主，中国领导人极力利用此次峰会提升自身国际领导者形象。习近平不仅强调要“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并反对美西方霸权，还提出所谓“全球治理倡议”，试图以“中国方案”取代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在会上宣布对上合框架内的国家提供更多经济援助、技术合作，包括推动上合开发银行和能源联盟等倡议。这些举措表面上标榜为发展中国家谋利，实际上是以国际主义之名行帝国主义之实：中国希望通过经济融资和基础设施项目输出，全方位控制亚欧关键资源和市场，以巩固自身资本输出和供应链安全。毛主义者早已指出，当代中国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是资本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是被压迫阶级和人民的敌人。如今中国打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招牌拉帮结派，正是其社会帝国主义本性的体现——以修正主义的伪装混淆视听，宣称反霸权却谋求自身霸权。

俄罗斯：面对西方严厉的制裁和自身经济衰退，俄罗斯更加依赖上合组织来稳固其国际地位。在此次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习近平、莫迪等亲密互动、把手言欢，展现出所谓“团结友好”的姿态。普京借机强调俄中印团结的重要性，以抗衡美国和北约的压力。在双边会晤中，普京和莫迪甚至共乘一辆装甲豪华座驾，凸显了俄印走近的姿态。这些场景表明俄罗斯极力拉拢亚洲伙伴，寻求多边背书其对抗西方的正当性。然而需要看到，俄罗斯自身亦是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其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就体现了其试图重划势力范围的强权逻辑。这次峰会上，俄方一方面感谢中印在能源贸易上对俄的支持（中印已成为俄罗斯石油最大买家），另一方面也试图利用上合平台巩固对中亚诸国的影响力。正如美联社分析所指出的，俄罗斯利用上合“联盟”框架开展地区军事合作（如联合军演、比武），即便能力受限，也不愿放弃对传统势力范围的掌控。这说明普京政权的“反西方”旗号，掩盖下的是自身大国沙文主义——既不真正支持他民族解放，也不会放弃自身的地区霸权野心。

印度：莫迪总理领导的印度以“战略自主”著称，在上合峰会上表现得相当精明务实。近来印度与美国关系出现了25年来最大裂痕（例如在贸易关税和地缘政治上摩擦加剧），因而莫迪此次出席峰会，一方面希望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在金砖之外拓展同中俄的合作，另一方面也藉此向华盛顿施压。会上印度支持多极世界的原则性表态，但也刻意避免过度倾向中俄阵营。例如，印度迄今没有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也拒绝在上合防长会议的联合声明上签字，只因为那份声明对克什米尔袭击事件的表述不符合印方立场。这反映出印度仍奉行其民族利己的路线：利用上合获取能源、市场和武器（印度从俄中大量购入石油和军备），但绝不在核心利益上受制于他国。莫迪政府打着不结盟的幌子，实则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为印度资产阶级争夺更大国际地位服务（例如长期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席位，却得不到中俄充分支持）。印度这种态度说明，其并非真正为了第三世界的解放事业，而是在大国角逐中谋求自身一席。莫迪政府鼓吹的“多极化”更多是想在中美俄之间渔利，而无意推动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斗争。

伊朗：作为新近正式加入上合的成员，伊朗寄望于这一东方联盟来打破美国的围堵。面对美以的压力，莱希政府（2025年伊朗总统已更迭为佩泽什基安）选择更深入地倒向中俄，希望在经济和安全上得到大国庇护。然而需要指出，尽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长期高喊“反帝”，其统治阶级也有自己的地区雄心 and 保守利益。在上合峰会上，伊朗积极支持中俄的多极化主张，强调“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但这事实上是在为自身谋求制裁松动和经济输血找靠山。中国与伊朗早有长达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大举投资伊朗能源和基建；俄罗斯也向伊朗提供军售和核技术援助。这些合作表面上帮助伊朗对抗西方压迫，但背后附带的是新的依附关系——伊朗可能因此陷入对中俄资本和市场的深度依赖，被纳入它们的势力范围。伊朗政府在国际场合常把自身描绘为伊斯兰世界和被压迫民族的代言人，实际上却没有动员本国劳动群众进行任何革命变革，也未真正支持阿拉伯地区人民的民主解放（相反还在叙利亚等地维护独裁政权）。在上合内融入中俄体系的伊朗，只会更加谨守大国游戏规则，而非输出革命。可见，伊朗统治集团打着反美反以旗号，但并不代表伊朗工农利益；它追求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即使与别的帝国主义结盟也在所不惜。这恰恰是一种典型的修正主义外交：混淆了反帝斗争与投靠另一个帝国主义阵营的界限，以“民族独立”之名行大国扩张之实。

总的来看，上合峰会上各国的表现，证明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本性的论断：在对外关系上，资产阶级国家不可能超越自身利益搞什么真正的平等互惠，有的只是暂时的同盟和交换，用以瓜分世界、压榨第三方或各自人民。即便这些国家彼此间也存在矛盾（如中印边界冲突、印巴宿仇、俄土分歧等），但在共同反对西方主导秩序、并争夺自身利益的动机下，它们选择在上合框架下联合起来混同视听。它们一边口头声称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多极公平，一边却各自在背后争当地区“老大”、从别国攫取原料市场、向小国输出资本和武器。所有这些，

都验证了毛泽东当年的警告：中国等新兴大国一旦骄傲自大、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也会成为社会帝国主义，迷惑和压迫第三世界人民。今天的上合峰会正是这样的现实写照：各国大佬在华丽厅堂合影笑谈，实际上是在为如何更好地统治压迫本国人民、攫取境外利益而勾连协调。



毛泽东思想视角：批判假国际主义，重申反帝真谛

面对上合峰会所呈现的乱象，我们有必要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廓清真正国际主义与假国际主义的分野。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伪国际主义”倾向。在1956年批评苏联教条时，毛泽东指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大国不应颐指气使，不能“翘尾巴”充老大，而应平等相待、夹紧尾巴做人。他痛斥那些大国沙文主义者“只顾本国的利益，不顾人家”。这一论断今天听来振聋发聩——正是对当今打着多边旗号行强权之实者的绝妙写照。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六七十年代与苏联修正主义论战时，多次揭露后者打着“社会主义大家庭”幌子行霸权统治东欧之实，称之为“假共产主义、真霸权”。苏共在名义上高举国际主义，实际却以老子党自居，干涉他国内政、掠夺他国资源。毛泽东将其斥为“现代修正主义”，即以背离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方式与帝国主义妥协甚至同流合污。今天，上合组织峰会上某些自称社会主义的执政党和反美先锋，再次炮制出类似的假国际主义。他们一方面高喊反对美国霸权、声称要代表“全球南方”伸张正义，另一方面却根本没有也不允许各国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决策，更遑论推动各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变革。他们提倡的“多边主义”不是真正旨在解放全人类，而是服务于少数大国利益的多边外交游戏。对此，我们必须运用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彻底揭穿其欺骗性。

真正的国际主义是什么？列宁早就给出明确回答：“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忘我地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并用宣传、声援和物质去支持无例外所有国家的同样斗争，并且只支持这种斗争”。也就是说，各国无产阶级首先要在本国打倒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相互支援彼此的解放斗争。这才是国际主义的核心要义。然而，上合峰会上的各国政府所实践的，完全不是这种无产阶级国际联合，而是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它们互相支持的是对方镇压人民、争霸扩张的路线，而非支持对方人民的革命斗争。这种联盟不仅不具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反而是在阻碍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毛泽东曾号召：“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可如今自诩“革命胜利”的大国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去无私援助他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反而热衷于同别国资产阶级政府做交易，用经济贷款、军火生意去左右他国内政，以确保一个有利于自身的“稳定”环境。这种行为哪里有什么国际主义可言？不过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利益交换。

现代修正主义者惯于偷换国际主义的真义。他们把国家之间表面的外交团结说成是真正的国际主义，却掩盖了国家内部阶级对立的实质。毛泽东早就批评过这种思路：“有人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这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帝国主义的。”他强调，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往往以民族形式出现。这句话本意是说，在反抗外国侵略时，争取民族解放有其进步意义。然而修正主义者歪曲这一点，把统治阶级的民族主义扩张也包装成“民族解放斗争”的一部分。例如，俄罗斯号称为了保护讲俄语居民而出兵邻国，宣称这是反对美帝北约东扩的正义之举；中国在国际上拉帮结派，说是为了发展中国家谋公道。然而，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为了各自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服务，跟真正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的斗争不是一回事。把大国争霸粉饰成“反帝斗争”，正是一种对国际主义的背叛和冒充。真正的反帝斗争，决不是让另一组帝国主义来瓜分世界，而是要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本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结语

2025年的上合组织峰会，以多边合作的面貌示人，却难掩其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本质。各大资本主义国家在峰会上相互呼应，标榜“团结”，实际上是在为各自资产阶级谋利，为重新瓜分全球势力范围而协调行动。这种由国家机器主导的联盟，代表的是各国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丝毫不代表各国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世界动荡不安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大国争夺霸权；而所谓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或联合，也往往意味着对弱小民族的新压迫。今天的上合峰会正延续了这一历史逻辑：假反帝之名，行分肥之实。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我们必须认清：真正的国际主义不在国家首脑的宴会上，不在修正主义者的外交词令里，而存在于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并肩战斗中。真正的国际主义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把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放在首位，并相互支援彼此的革命事业。只有各国人民推翻本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帝国主义的全球体系才会土崩瓦解。所谓“多极世界”如果只是多个帝国主义中心瓜分世界，那对被压迫人民而言绝非福音。正如列宁所谆谆教导的：与其空谈民族大国的荣耀，不如埋头推动本国的革命；与其寄望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如加强无产阶级国际大团结。

综上所述，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一针见血地分析了2025年上合峰会的真相：它不是世界和平的新希望，而是帝国主义列强合谋稳固其统治的又一次聚会；其中充斥的不是平等互惠的真正多边主义，而是混杂着大国沙文主义的假国际主义。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帝国主义无论披何种伪装，都是世界人民的死敌。各国劳动群众不能被峰会上的华丽词藻所迷惑，不能对任何帝国主义抱幻想，而应当加强觉悟，联合起来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整个帝国主义体系。这才是对所谓“国际主义”一词最好的捍卫。让我们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各国人民团结斗争，共同打碎一切帝国主义锁链，创造真正属于劳动大众的公正和平的新世界！



偶像崇拜如何麻痹阶级意识 —— 从马列毛主义看田中裕之网络爆红现象

引言

日本演员田中裕之近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爆红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个曾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自称“热爱中华文化”的日本人，通过在网络上发表亲华言论（甚至包括在台湾街头高举五星红旗、高喊“台湾是中国的”），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网民追捧的“网红偶像”。田中裕之的自我包装极具戏剧性：他声称自己曾遭受日本社会的不公对待，直到赴中国留学工作后才“爱上中国”，并羡慕中国“没有黑道欺压百姓、可以天天吃到高级水果、全民团结抵制日本ACG文化，还有比日本先进的电子支付”等等。更夸张的是，他表示自己“最大的目标是在日本打造第二个中国”。在中国互联网上，田中裕之迅速积累了不俗的人气，被一些网民亲切地称为“日本狸猫老师”。然而，这种看似偶然的跨国偶像崇拜现象绝非表面上那么简单和无害。从马列毛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有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田中裕之走红背后的社会阶级根源、意识形态功能，以及资本主导的文化工业操控机制，深入批判消费主义与偶像崇拜如何转移群众斗争视线、麻痹阶级意识，并剖析现代修正主义在其中所扮演的纵容与助推角色。

现象剖析：田中裕之在华爆红的背后

田中裕之现象表面上看是一个“外国友人”因亲华言行而得到中国网友追捧的故事。2025年8月，他与同伴在台北街头高举五星红旗并公开宣称“台湾属于中国”，结果被台湾当局以“危害公共秩序”为由当日驱逐出境。这一事件的视频上传大陆社交媒体后，立即引发轰动。他利用微博、B站等平台频频发表亲华言论，塑造出“热爱中国反思日本”的个人形象。例如，他曾在社交账号自述自己童年被母亲虐待、在日本职场受欺压，来中国留学后发现“新天地”并希望成为中国人。他甚至在今年2月将自己的日文名改成了中文名字，以示彻底“归化”的决心。田中还宣称娶了一位台湾妻子，自称“现在有中国老婆了”。这些充满戏剧性色彩的桥段迎合了一部分大陆网民的胃口，他们将田中裕之奉为“敢于讲真话的日本人”“知华友华的榜样”，田中的微博粉丝量和播放量随之飙升。值得注意的是，田中本人并非毫无算计的“自来粉”：据媒体报道，他直言参与这些表演是为了提升自己在中国的曝光度和粉丝基础。换言之，这场跨国圈粉闹剧更像是一出精心设计的自我营销。田中裕之曾在日本因携刀具闯街并高呼“日本扩军是要侵略中国，我要切腹谢罪”而被捕——这种极端行为表明，他不惜采取非常手段来博取眼球。短短几个月内，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中年日本人，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网络上的爱国“偶像”。这一离奇现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动因和利益逻辑？我们必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深入剖析。

阶级根源：偶像崇拜的社会土壤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田中裕之的爆红并非偶然，它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特殊的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氛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分化加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层形成了民族自豪感与消费享乐主义交织的心态。一方面，他们渴望民族复兴带来的国际尊重，倾向于把民族主义认同置于阶级认同之上；另一方面，他们也在资本主义市井中追逐物质享受和娱乐消遣，形成了对偶像明星、网络红人的追捧文化。这正是田中裕之现象得以发生的社会土壤：民族主义情绪与消费主义心理的结合。田中对中国的颂扬，其实聚焦于物质和秩序层面——诸如“治安好、物质丰裕（高级水果）、科技便捷（支付宝）”等，这些论调恰恰投射出部分中国都市中产阶层的自我满足和炫耀心理。他们乐于从一个外国人嘴里听到对中国繁荣富强的称赞，从而获得身份认同上的满足感。这种心理满足本质上是一种虚幻的阶级超越：被赞美的“成就”更多属于民族和国家层面，而非劳动人民阶级自身的解放。但不少人沉浸于这种外部赞美中，反而忽视了国内阶级分化和不公。例如，当田中津津乐道中国的安定繁荣时，很少有人去追问：这安定繁荣是否同样惠及了工人、农民和底层劳动者？这种缺乏阶级视角的民族自豪，实际上迎合并巩固了现存秩序。

更进一步，田中裕之被追捧也反映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被动。当工农群众的真实诉求和阶级利益在主流话语中被遮蔽、边缘化时，他们容易被民族主义和偶像崇拜所吸引，转而将情感寄托于这些符号化的“英雄”人物上。田中裕之以一个日本人的特殊身份出现，更强化了一种意识形态功能：通过外部视角来印证“中国模式”的优越。这种“借他人赞美来佐证自己正确”的手法，对那些对现实不满又缺乏阶级分析的人而言，具有相当的心理安抚作用。在这里，我们看到偶像崇拜超越了个人迷恋的范畴，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现象：它营造出民族凝聚力的幻象，却掩盖了内部的阶级断层。这种意识形态功能客观上转移了群众对社会矛盾的视线，使人们倾向于认为只要国家强大、民族光彩，个人境遇不佳也是可以暂且容忍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统治阶级常常利用民族主义来掩盖阶级矛盾。田中裕之现象正是这样一种案例：当大众把掌声给了一位宣传“中国好的”外国偶像时，他们的愤懑和要求很可能被引导到一种非对抗性的出口，从而减弱了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权贵资本的批判力度。



资本操控：文化工业的逐利机器

田中裕之的走红，离不开资本主导下的文化工业运作。表面上，他是在自发地表达对中国的热爱，实际上，他的每一步几乎都踩在商业算计和流量逻辑上。在资本逐利原则支配的网络平台和娱乐产业中，“流量即金钱”已成为铁律。一条博人眼球的视频、一个引发热议的话题，都可能转化为点击量、打赏和商业价值。田中裕之深谙其道，他坦陈自己高调亲华是为了吸引中国粉丝、扩大网络声量。而社交媒体平台和资本也乐于推波助澜：只要有热点、有流量，他们便能从中分得广告和打赏收益。这背后是一整套资本操控舆论与文化的机制：平台透过算法推荐和热搜榜单，将田中这样的话题人物推送给更多用户；商业机构则可能趁机与田中合作变现（如付费直播、日语课程销售等）。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多诺所批判的那样，“文化工业”将启蒙蜕变为统治大众的工具，把文化沦为权力的纯粹附庸和麻醉民众的意识形态工具。表面上看，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发声机会，但大众文化中的“自发”潮流往往是被资本精心算计和操纵的结果——其本质与极权主义的宣传机器并无二致。

当代中国的娱乐文化领域，早已被资本编织成一张庞大的逐利网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平台资本、流量明星、“饭圈”文化在资本主导下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这一链条完全服务于资本攫取超额利润。平台公司居于主导地位，精心挑选和包装“人设”，无论是歌舞明星还是网络红人，只要能迎合受众心理、吸引眼球，资本就会把他们打造成流量偶像，然后通过流量变现大肆赚钱。田中裕之显然成了这套机制的最新“产品”之一——一个异国背景的猎奇人设，恰好契合了一部分网民的胃口。资本透过抓住粉丝非理性的心理和需求，可以制造出各色“巨星”“顶流”供人狂热追捧，通过粉丝消费、“应援”众筹等手段牟取暴利。这一过程严重违背了文艺应有的人民性和艺术规律，却在资本的推动下大行其道。以今年轰动一时的某选秀节目的“倒奶事件”为例：赞助商为了销量，在选票与商品捆绑销售的模式下诱导粉丝过度消费，导致成千上万瓶牛奶被粉丝买来直接倒掉，只为获取瓶盖上的投票码。一时间舆论哗然，官方被迫叫停节目并痛批这种现象。这起事件揭露了当代偶像产业的本质：粉丝被当作待宰的“韭菜”，资本与平台为追逐利润不惜制造荒诞的浪费和疯狂。田中裕之现象与之异曲同工——尽管形式上侧重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但背后的运作同样是资本对于流量和注意力经济的逐利操控。社交平台故意纵容和推热这类猎奇偶像，因为点击量就是现金流；田中本人则希望借民族主义情绪撬动粉丝打赏和商业机会。这一切说明：田中裕之的走红并非民意的纯粹表达，而是资本在文化战线上的又一次收割行动。

偶像幻象：消费主义如何转移斗争视线

资本制造的偶像幻象，对大众意识的危害在于：它以娱乐消费的狂热麻痹了群众的革命警觉，转移了阶级斗争的视线。马克思曾把宗教称为“人民的鸦片”，而在当代社会，铺天盖地的娱乐偶像和消费狂欢某种程度上成了新的“精神鸦片”。具体来说，偶像崇拜和消费主义通过以下方式麻痹群众的阶级意识：

- 转移注意力：普通群众在工作和生活中遭遇的困难（如剥削、贫富悬殊、不公正待遇），本应激发他们思考社会制度的问题。然而偶像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宣泄出口与幻想空间。当人们将精力投入追星、刷短视频、打榜应援时，他们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懑往往被转移、淡化了。田中裕之这样的话题人物，以猎奇和情绪刺激占据公众讨论空间，使严肃的阶级议题让位于浮华的谈资。
- 塑造虚假认同：消费主义鼓吹通过购买和追逐潮流来获得身份认同，偶像崇拜更是让粉丝将偶像的荣耀视作自己的荣耀。许多底层青年在现实中缺乏上升通道，便从偶像身上寻求心理补偿——“我的爱豆功成名就，我也脸上有光”。这种心理机制令人沉湎于他人成功的幻觉，却忽视自我阶级处境的改善。比如，一些粉丝为支持偶像不惜倾家荡产、借债氪金，甚至出现高中生偷拿父母血汗钱为明星投票的荒唐事例。这正是被消费主义洗脑后的不理性：他们错把对偶像的忠诚当成了人生价值，却忘了偶像的辉煌并不能改变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现实。
- 强化服从心理：狂热的饭圈文化培养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从众和服从心理。粉丝对偶像往往顶礼膜拜、言听计从，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当数以百万计的人可以盲从于商业包装的明星，他们对权威和资本的顺从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许多饭圈出身的“小粉红”正是如此，在偶像身上养成了不加质疑的拥护习惯，进而对官方宣传也是全盘吸收、不作分析。如此一来，批判精神与反抗意识被严重弱化。广大群众被训练成娱乐工业的顺民，看不清幕后真正操纵和压榨他们的是谁。



通过这些机制，消费主义和偶像崇拜成功地麻痹了人民的阶级觉悟。工人阶级本应认识到自身作为被剥削者的地位，联合起来同资产阶级斗争；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本应看清谁是压榨自己的真正敌人，进而组织起来争取权益。然而，当流行文化的洪流把每个人变成追星族、购物狂、吃瓜群众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潜能被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忙于在屏幕前为偶像欢呼雀跃，资本家却在幕后悠然自得地榨取剩余价值；人们为娱乐事件争得脸红脖子粗，却很少有人再去关心工厂里减薪裁员、农村里土地被侵占等攸关切身的斗争。这种状况正验证了列宁的一句警句：“资产阶级如果要统治，就必须把奴隶的意识灌输给被统治者。”而当今的偶像工业和消费文化，正是通过声色犬马的狂欢，把无产阶级“驯化”成不问政治、不讲斗争的驯顺消费者。对于这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攻势，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

现代修正主义的纵容与助推

田中裕之现象之所以能够出现并发酵，除了资本逐利和大众心理因素外，还离不开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纵容与助推。这里所说的现代修正主义，特指某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却背离其根本原则的思潮与政治路线。在文化领域，现代修正主义往往表现为对资本主义文娱产业的妥协和迎合，对群众思想教育的放松，甚至主动利用庸俗文化来维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视修正主义在田中裕之现象中的作用：

首先，淡化阶级斗争教育，为偶像文化滋生提供空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阶级分析和阶级教育被淡化甚至边缘化。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曾反复强调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除了枪杆子，还需要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然而在后毛泽东时代，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被视作“过左”的东西遭到抛弃。官方话语更强调社会“大团结”和文化多样化，却忽视了资本主义思潮在文化上的泛滥。当阶级警惕性丧失时，资本主义的文化产品就长驱直入。各类选秀节目、偶像剧、商业大片席卷荧屏，扭曲的饭圈文化兴盛一时。在这种大环境下，一个田中裕之的走红绝非意外——因为意识形态的防线早已被修正主义放松，大众缺乏辨别什么是无产阶级需要的进步文化，什么是资产阶级制造的精神鸦片。田中之流于是被当作“正能量”偶像加以推崇，而批判他现象本质的人反倒成了“不合时宜”。



其次，以民族主义替代社会主义，客观上鼓励了田中式现象。现代修正主义往往热衷于高唱“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却很少谈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阶级联合。当前中国主流话语体系中，爱国主义被提升到极高的位置。不可否认，爱国主义有其正面价值，但当它变质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脱节时，就可能被资产阶级所利用。田中裕之现象正是狭隘民族情绪的一次狂欢：因为他说出了令某些民族主义者舒服的话——“连日本人都说中国好”——他就被追捧为英雄。然而这种民族情绪背后缺少对阶级利益和社会制度的分析，甚至成为掩盖社会问题的烟幕弹。现代修正主义者对这种表层的民族主义倾向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予以利用。毕竟，比起鼓励工人罢工、农民抗争，他们更乐于看到网民把热情发泄在狂欢的爱国帖文和追星行为中，因为这有利于维持现存秩序的稳定。可以说，修正主义当局默许甚至鼓励了以消费主义方式表达爱国热情的种种闹剧。像田中裕之这样的外国“亲华偶像”，某种程度上也充当了官方宣传里的“榜样”，被用来验证“中国模式的魅力”。今年田中在台湾被驱逐后，大陆的某些官媒网站对他的事迹迅速转载报道。这等于是在为他背书，让更多人知晓并追捧他。这种宣传思路无疑是短视的——它或许一时满足了民族虚荣，却纵容了庸俗文化，长远看腐蚀了人民的革命品质。再次，对娱乐资本积累长期放任，导致资本反客为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娱乐产业在市场力量推动下迅猛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娱乐业被视为经济增长点和软实力建设的重要部分，各种资本长驱直入，形成了庞大的文娱帝国。直到近年来因明星丑闻和饭圈乱象引发民怨，执政者才开始出手“整治”娱乐圈。然而治标易，治本难。中共中央纪委会机关报曾痛批：“一些素质不高、能力平平的艺人却能一夜走红、万众追捧，归根到底是资本逐利的结果。资本抓住粉丝非理性的心理，制造‘巨星’‘顶流’，通过粉丝消费、应援集资牟取暴利。明明是违背文艺规律和人民利益的事，却在资本推动下大行其道。”这段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娱乐乱象的根源。但必须看到，这种局面正是在过去相当时期资本无序扩张中形成的，而当时的意识形态路线对这种资本力量缺乏警惕和约束。换言之，现代修正主义在相当程度上纵容了资本对文化领域的渗透和控制。即便现在开始整治，资本已积累了雄厚势力，并学会了更加隐蔽的操控手段。田中裕之的爆红所体现的“民族主义+娱乐”模式，就是资本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应变——打爱国牌包装偶像，以规避一般娱乐的低俗之名，同时继续收割流量红利。对此，如果没有更深刻的路线觉醒和制度变革，单靠行政命令式的整顿无法根除病灶。

最后，漠视文化阵地建设，革命文化被边缘化。毛泽东时代曾极为重视以社会主义思想文艺去占领文化阵地，用工农兵文艺鼓舞群众斗志。然而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中，真正反映工农生活、宣传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文艺作品少之又少。相反，充斥大众媒体的是玄幻仙侠、偶像言情、综艺真人秀这类商业文化产品。革命文化的弱化使广大青少年对马列毛主义理论和历史缺乏了解，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流于肤浅。在这种环境中，年轻一代更容易追逐偶像明星，而不去崇敬为国为民奉献的英雄模范；更关注娱乐八卦，而不熟悉革命先烈的事迹。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修正主义教育失职的体现。当年毛主席号召“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一切文化阵地”，而今许多阵地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趣味。这正是田中裕之流可以大行其道的重要前提。

总而言之，现代修正主义在文化上的放任和利用态度，与田中裕之这样的现象是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修正主义路线制造了意识形态的真空和失焦，让资本主义文化有机可乘；另一方面，这些庸俗文化又进一步麻痹群众、削弱革命力量，使修正主义路线更容易维持。可以说，田中裕之现象既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产物，也是现代修正主义阴影下的怪胎。

结语

田中裕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爆红，看似一出现代网络狂欢，实则折射出当今社会深刻的阶级问题和意识形态斗争。马列毛主义的立场告诉我们：文化绝非超阶级的纯娱乐领域，而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战线。在这个战场上，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正以偶像崇拜和消费主义武装起来，企图瓦解无产阶级的斗志和觉悟。田中裕之现象警示我们：当大众为一个包装精致的偶像欢呼时，更应警惕背后掌控欢呼节奏的那只无形的手——资本，以及默许这种荒诞剧上演的修正主义思潮。

拨开偶像的光环，我们看清了其背后的阶级迷雾：资本逐利链条在欢笑声中暗暗运转，意识形态机器在鲜花掌声中悄然磨掉人民的棱角。如果无产阶级不能在文化上赢得主动权，那么即使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取得一时胜利，也可能被资产阶级通过文化“和平演变”所反攻倒算。历史的经验无比惨痛，苏联的教训尤为如此。对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一方面，要大力批判和抵制资本主义的偶像文化。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人，需要提高媒介素养和阶级觉悟，不做资本牵线的木偶，不盲从虚假的偶像神话。每当出现类似田中裕之这样的现象时，革命左派理应站出来揭穿其本质，引导群众思考：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偶像？那些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革命者、无私奉献的劳动英雄，才应是我们敬仰的榜样；而靠迎合情绪、背后有资本逐利的网络红人，不过是转移视线的烟火。一旦群众认识到这一点，偶像的魔力就会消解，阶级意识便会回归。

另一方面，更根本的，在于重建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这需要真正贯彻马列毛主义路线，肃清现代修正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我们要再次高举起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明的旗帜，让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扶持和创作扎根现实、启发斗志的革命文化作品，挤压庸俗文化的市场；要在教育宣传中突出阶级分析，引导群众把眼睛向下、向内看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只顾向外寻求心理安慰。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一刻不能放松。正如毛主席所言，光有枪杆子还不够，还要有笔杆子；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不能战胜敌人。今天，我们面对的不仅有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更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文化侵蚀。如果任由后者蔓延，无产阶级将陷入头脑麻木、精神萎靡的状态，又谈何在现实中奋起革命？

田中裕之的走红终究不过是过眼云烟，但它留下的教训值得深思。它再次提醒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种流行文化现象背后都有阶级的幽灵在舞动。让我们擦亮眼睛，以马列毛主义的锐利武器，洞穿偶像幻象的迷雾；以战斗的姿态，占领文化阵地，唤醒更多群众的阶级觉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既打败物质世界的剥削势力，也粉碎精神领域的奴役枷锁，迎来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与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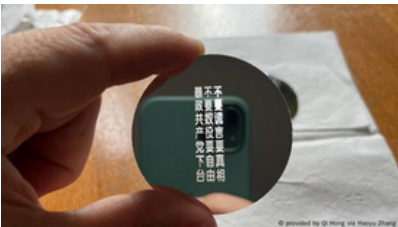
论2025年重庆大学城投影事件

事件概述

2025年8月29日晚约10时，重庆大学城熙街一幢高楼外墙上出现多条巨幅投影标语，呼吁“推翻共产党暴政”，持续约50余分钟，引发广泛关注。这些标语内容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等，现场有路人围观并以手机录像。据当地异议人士周先生向自由亚洲电台（RFA）透露，事发当夜警力并未及时介入，但次日早晨校园安全态势骤然升级。校内辅导员当时紧急提醒学生“少说话，别乱评论”，并很快出现多名便衣警察进入监控室检查录像，校门外设立检查岗加强巡查。这表明校方事后已全面封锁信息、排查相关设备。

监控显示，投影光源来自熙街对面一处名为“嘛嘛公寓”的出租屋。警方调查时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才确认房间，但行动发起者已离开现场，只留下了一封手写信。该信上书写道：“中共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请尽量不要助纣为虐……共产党就是法西斯”（见下图）。图：重庆大学城投影事件发起者戚洪留在现场的亲笔信，内容指责中共“罪恶罄竹难书”，并呼吁基层执法者“不要助纣为虐”。

行动组织者是一位自称43岁的重庆人戚洪（生于1982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举并非冲动之举，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他曾受到“北京四通桥勇士”彭立发和2022年“白纸运动”学生们的启发，认为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心声，呼吁人们追求民主与自由。戚洪回忆，自己16岁辍学后曾辗转广东东莞打工，后又在北京生活。2025年7月初，他开始筹备行动，参照山东济南柴松用投影抗议的方式，购置了一台600W投影灯、3台监控摄像头、一个可远程定时控制的开关、一台路由器和一张手机卡。戚洪选择重庆大学城熙街作为投影地点，认为此地大学云集，可视为“播撒种子”，期待年轻人未来觉醒。他于8月20日离境前往英国，并通过远程操控于29日晚点亮投影设备。事后，他称自己虽然“紧张害怕”，却没想到影响如此巨大，众多网民翻墙在线观看其访谈，称他为“重庆英雄”、“勇士”，并嘱咐注意安全。



事件影响：戚洪行动被媒体称为“投影革命”，随即成为海内外舆论焦点。重庆警方加大对大学城的管控，据报道在投影事件曝光后，警方对戚洪家属展开调查，其母亲和亲戚被传唤审问，兄长也被带走，戚洪位于重庆的电脑和书籍等资料被查抄。学校方严格审查门禁和监控，加强巡逻，防止类似事件重演。总体而言，本次投影抗议以极快速度在网络上传播，对官方信息封锁带来冲击，也再次彰显了中国青年群体和社会大众隐秘但旺盛的异议情绪。

社会背景与阶级矛盾

本次事件反映出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一方面，中国经济近年来增速放缓，社会结构分化加剧。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4月全国16-24岁城镇年轻人失业率高达14.7%，但有学者估计如果计入依赖父母生活者，则该年龄段失业率可能高达4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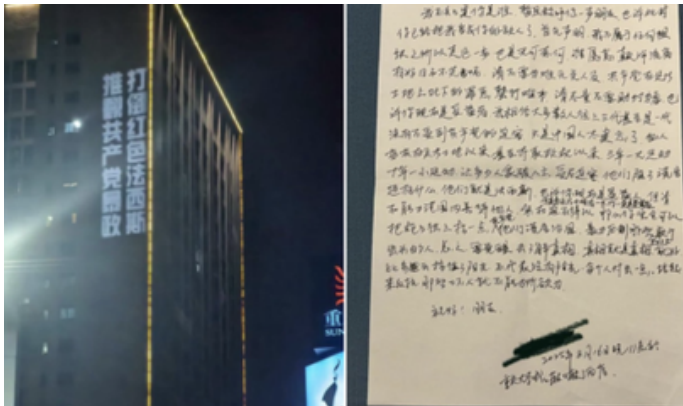


房价高昂、结婚养育成本剧增，使许多年轻人倍感压力，以至出现“躺平”逃避现实的消极情绪。高学历毕业生供过于求，但优质岗位稀缺，很多学生对未来就业前景和社会公平产生失望情绪。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长期由国家和党政体系主导的“官僚资本主义”结构深化。一份分析指出，国有企业占据中国最重要行业的主导地位，150家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相当于GDP的三分之二，核心管理层几乎均由党政官员担任。这种“官办企业+党政权力”的模式造就了小规模、既得利益阶层。一位研究者指出，因党政腐败而进入财富前1%的多达91%，若无贪腐，这些官员几乎不可能跻身上层阶级。而依附于他们的民营富豪群体也只能“随着他们一起兴衰”。结果是，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前中国被认为是最平等的亚洲社会之一，但如今按基尼系数等国际标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已超过印度、美国乃至巴西。有研究指出，上亿农民工和小企业主收益微薄，而国有资产常常通过不透明的方式倾斜给特权阶层。

在这种结构中，工人阶层和普通民众积累了大量矛盾。近年来民工罢工潮频发：据统计，2023年全国爆发434起工厂罢工，是2022年的十余倍。这种激增部分由于经济下行、订单减少导致大量低端制造业工厂搬迁关停，老板常以欠薪或“拖欠补偿”逃避赔偿，引发工人聚众抗议。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也未得到有效解决，基层纠纷多通过示威、网络曝光等方式爆发。中国政府始终将“维护社会稳定”置于高于群众申诉之上，许多冤情难以进入司法或行政体系解决，催生各种出格抗争形式。

学生群体同样矛盾尖锐。一方面，他们受到党国宣教的政治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双重影响，对民主、自由与公义抱有诉求；另一方面，就业、家庭责任等现实压力使他们对专制体制感到不满。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便是一次爆发：民众拿空白纸抗议零COVID政策，既表达了对言论管制的不满，也体现了对官僚专制的不信任。在国家资源和话语权高度集中、社会阶层流动困难的背景下，当代学生和年轻劳动者越来越难在体制内找到出路，这种结构性矛盾在疫情后有愈演愈烈之势。



与历史行动的比较

重庆大学城投影事件在表达形式上与近年多起群体行动存在相似性，也有其独特之处。2022年11月的“白纸运动”中，全国数十城市的示威者自发举白纸，反对清零政策并嘲弄言论审查。群体抗议迅速蔓延，部分人高呼“打倒共产党”，数周后政府放弃严格防疫政策。相比之下，重庆投影只持续50分钟、参与者极少，却使用了更直接的文字口号和技术手段。

2022年10月13日的北京四通桥事件是一例罕见的个人抗议：一名男子伪装成工人，在北京海淀四通桥横幅“讨伐”习上海平，横幅上写着“让我们罢工、罢课、罢免独裁的国家元首习近平”。此举不仅点燃了网民热议，也让当局紧急出动警力巡逻。济南万达广场事件（2023年2月）则是中国首次记录到利用远程投影进行政治抗议：抗议者柴松在楼顶远程操作投影仪，将“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等标语投射到楼面上。这两起事件都直指中共核心领导人，标语措辞与重庆事件有高度重叠，但技术不同：一是挂横幅并点燃轮胎，形成浓烟；一是巧用投影仪在夜晚贴墙书写。

重庆投影与上述行动相似点在于：首先，它们均为以个人或小组自发进行的政治行动，未经过组织批准或公开号召，参与者通常匿名行事。其次，诉求都针对中共专制本身，口号中屡次出现“推翻共产党的暴政”“罢课罢工罢免习总”等激进表述，展现了对体制的公开蔑视。再次，它们依赖现代媒介传播：白纸运动靠微博和微信组织，四通桥视频通过网络流传，投影行动则直接将画面留存于视频中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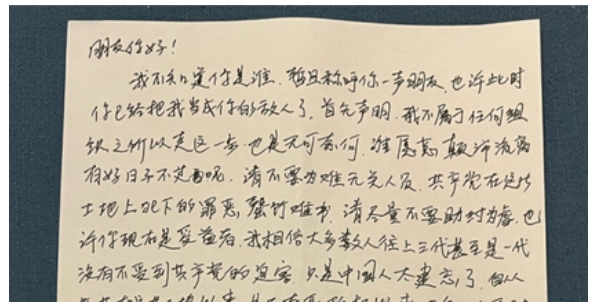
不同之处也很明显：重庆和济南的投影行动利用远程设备，实际操作者未在现场出现，相比前者暴露更少；白纸运动和四通桥则至少存在当场人物。参与规模上，白纸运动动员上万人，影响深远；而后者均为孤立事件，参与人数极少，但易于激发舆论关注。内容风格上，白纸运动更多象征性诉求（空白纸象征“无法说出口的言论”），而投影和横幅则直接吐露了推翻领导人的政治口号，攻击性更强。发展趋势来看，专家指出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此类零星但符号意义强烈的抗议行动可能增多。事实上，自四通桥后，中国各地已出现多起徒步游行、桥梁标语、校园吊横幅、张贴小纸条等不同形式的抗议，虽被官方迅速清理，但说明底层不满仍在涌动。

投影抗议的象征意义与局限

投影作为抗议形式有其独特象征与局限。一方面，投影抗议突破了传统抗议模式的地域和时间限制：利用强光灯将文字投射到高楼外墙，宛如在黑暗中照亮真相，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象征着对官方信息封锁的直接反击，使得文字在公共空间短暂可见又难以立刻抹除。正如律师陈先生所言，投影这种方式“直接，一两句话就表达态度，不易被阻止，需要事先周密准备”。与散发传单或悬挂横幅相比，投影更难被人察觉——使用无人监视角度进行，可以在没人注意时迅速完成，再隐藏设备离开，给执法者反应赢得缓冲时间。

但它也存在明显局限：传播范围有限。投影必需直接面向建筑物，必须靠近目标地点，受地点条件限制；观众只限于附近或通过网络看到视频。时效性短，一旦天亮灯光消失，宣传效果也会立即结束。易受技术和执法干扰，比如电力、网络受阻或现场巡逻可提前阻止。更关键的是，这种单一的技术行动无法像大规模集会那样形成社会压力，也难以将需求转化为制度性改变。投影本身是一种象征性爆破，表明抗议者“灯塔式”地照出真相，但要唤起更广泛的政治运动，还需更多后续力量。

在信息传播层面，投影行动依赖网络和海外媒体的传播。在中国大陆，相关视频和报道往往被审查。此次事件的视频主要通过海外社交账号（如“李老师不是李老师”）流传。国内大量网民只有翻墙后才能知晓详情，网上言论被严控，普通民众很难现场目睹。政府对公共空间的控制也极为严格：楼宇外墙、桥梁等敏感位置均有监控摄像头，人员密集时警力戒备，会及时清除异议标语。在这一背景下，投影标语在短时间内虽然惊艳夺目，但官方快速升级校园、社区巡查，也表明当局可以在后续施压中加以遏制。正如戚洪所感慨，尽管事发地校园警力迅速增多，对他而言个人能做的只有“种下一颗种子”，并不指望立刻带来宏大变化。



异议者策略的演变

近年来，中国异议者的抗争策略发生了明显变化：更加分散化、技术化和全球化。一方面，许多持不同政见者选择流亡海外，以规避国内打压。戚洪就提前出境，并在英国操纵投影行动。类似地，济南抗议人柴松逃往美国继续活动。海外的安全环境让他们得以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和网络电视等手段发布信息；许多流亡者还组建起广播节目、播客和网评平台，像“袁莉Bumingbai播客”便对戚洪进行了跨国采访报道。这显示抗争行动的节点已从街头扩展到虚拟空间和国际舆论场。

另一方面，国内外的技术手段日益被利用。除了高亮投影外，还有通过无人机撒传单、网络直播游行、匿名QQ群组织交流等新模式。中国政权为此加强网络监控和实名制要求，但异议者也在学习加密通信、VPN翻墙和使用化名账号。例如针对中共情报对策，一项调查指出，海外异议人士常用网名、加密聊天软件来保护自身安全。而在国内，学生和维权人士通过匿名论坛和海外社交媒体（如Twitter、YouTube）来“自留发声渠道”。

总体看，自2022年以来无组织的散发式抗议显著增加。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指出，自2022年5月以来中国发生了逾11000起各类公开抗议事件，其中2025年上半年约有3000起，比2024年同期增长75%。这些抗议往往由民众自行发起、以局部议题为由，却常常演变为对当局政策的不满宣泄。社交媒体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无论是“白纸运动”还是2025年江油事件，都是借助微信、微博等渠道组织和传播。面对日益激烈的社会不满，当局亦在加强监控和法律手段加大压制，但禁锢言论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异议声音转向海外平台与新型抗争形式。

总之，重庆大学城投影事件是中国大陆近年来零星抗议行动的一个缩影。它综合体现了当代中国学生和社会底层对“官僚资本”体制的不满，以及政治表达空间被压缩后所采取的创新抗议方式。尽管影响有限，但其象征意义和传播效应令外界关注，也为学界观察中国权威与民众之间不断演化的博弈提供了一个案例。

论江油事件

引言

2025年盛夏，一场发生在四川江油市的校园欺凌悲剧点燃了久蓄的民怨，演变为大规模群众抗议。一名14岁女学生遭3名女同学长达数小时的辱骂殴打，施暴者拍摄视频并炫耀“进公安局十多次没事”。当地警方拖延10余天才介入调查，将此恶性事件定性为轻伤案、以批评教育和轻处置结案，引发群众强烈质疑。8月初，上千市民聚集街头，高喊“严惩凶手”“还我民主”等口号，要求公正处理。然而，地方政府迅速出动大量特警暴力清场，甚至将被捕抗议者如牲口般装入运猪笼车游街示众。深夜，约两千民众再度涌上街头，对峙武装警察直至凌晨，酿成近年来罕见的流血冲突。官方随后全面封锁消息，删除网络帖文，将正义呼声硬生生定性为“交通堵塞”等治安问题予以压制。江油事件不仅是一起校园暴力案件，更是一次群众对社会不公和官僚冷漠的愤怒爆发，凸显了当今中国社会深刻的阶级矛盾和制度性危机。本文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剖析江油事件的背景和意义，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如何在意识形态上遮蔽阶级斗争、在实践中扼杀群众行动，并提出走群众路线、反对修正主义以解决深层社会矛盾的出路。

群众诉求的正义性与事件的阶级背景

江油群众的抗议绝非空穴来风，而是长期不满于社会不公和权力滥用的集中爆发。导火索是校园欺凌案处置不公：受害者父母报警十余天无果，官方试图“大事化小”草草结案，引发公愤。更令人愤慨的是，欺凌者扬言“进公安局没两天就出来”，暗示其背后有特权庇护。尽管当局事后澄清施暴者家长并非权贵，但警方黑箱操作、缺乏透明度的处理方式早已动摇公信力。群众走上街头高喊“严惩凶手、依法办案”，表达的是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诉求，对官僚权贵横行的不满。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江油普通工人、市民、学生正是抱着对社会正义的期望，勇敢站出来推动历史前进。他们的要求——惩办施暴恶徒、公开透明执法、保障弱者权益——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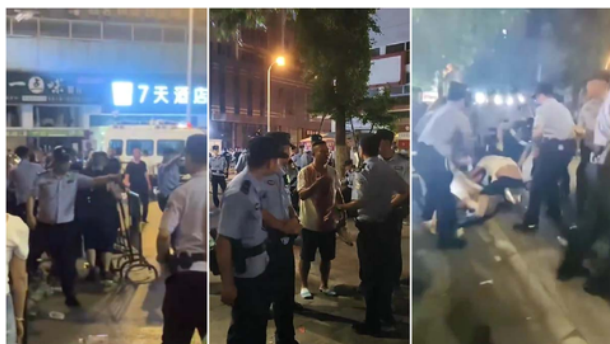


然而，这场自发的群众行动背后更深层的阶级矛盾不容忽视。长期以来，社会两极分化加剧，新生特权阶层与普通劳动群众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当执法和司法成为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护身符，当“官二代”“富二代”仗势欺人却屡屡逃脱制裁，劳动人民对子女安全和社会公平的焦虑愤懑就会不断积累。江油事件中，传言欺凌者家庭有背景、受害者母亲是弱势的聋哑人——这更使民众将个案置于阶级压迫的大背景下理解，视作“老百姓斗不过有权人”的缩影。毛泽东一再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当今社会的尖锐不公正是阶级斗争新形式的体现：表面上是未成年人冲突，实质上折射出官僚特权阶层对群众的压迫与漠视。群众之所以聚众抗议，正是出于被压迫阶级对不公的本能反抗——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地方政府的强力镇压与修正主义执政逻辑

面对汹涌的民意，江油地方当局的回应不是倾听群众呼声、严惩犯罪伸张正义，反而是出动大批警力粗暴镇压，充分暴露了修正主义路线下政府与人民的对立面。8月4日至5日，江油市政府调集特警、防暴警察，对手无寸铁的市民祭出高压手段：白天抓捕示威者，傍晚驱散人群，凌晨更以辣椒水、催泪弹和警棍大打出手，造成血迹斑斑、多人伤亡被捕的惨烈场景。有警察将倒地无反抗的群众反复殴打、拖行示众，其暴行之嚣张令人发指。当局甚至启用运猪铁笼车运送被抓群众，将抗议者当作牲畜羞辱游街。这些残忍举措，只为制造恐怖气氛来吓退更多抗议者。然而事实证明，“镇压一次，激起十次”——白天的清场反而激起晚上更多市民二次聚集，连中学生都走上街头手挽手与警察对峙，高唱国歌、讽刺高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来质问当局。毛泽东早就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坚持群众观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江油官员不仅没有把群众当主人，反而视群众如仇寇，用镇压代替对话，用谎言封锁代替回应关切。这种倒行逆施，正是背弃群众路线的修正主义执政逻辑的典型表现。

修正主义统治者最害怕的，莫过于群众觉醒和群体行动。他们鼓吹“稳定压倒一切”，极力掩盖阶级矛盾，对内麻痹人民不要起来斗争。当江油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争取正义，地方当局第一反应就是将之定性为“群体性事件”加以压制，把受害者父母跪地请愿这样的正义之举说成“扰乱秩序”。一场声援受害女孩的群众行动，硬被官方话术手术刀般地肢解成纯粹治安问题。这一过程中，官媒集体失声，微博上有关“江油”“霸凌”的热搜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粉饰太平的宣传。种种迹象表明，在修正主义路线支配下，某些执政者早已脱离了人民，蜕变为高高在上的特殊利益集团，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诉求充耳不闻，一遇民众抗争只会祭出专政机器保自身安稳。毛泽东曾痛斥这种现象：“我们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他提醒干部：“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我们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对照江油官员让哭跪的受害者母亲滚开的恶劣行径，对照警方挥舞警棍殴打自己人民的血腥画面，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人还配称人民公仆、共产党人吗？他们哪里还有半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归根结底，当年毛主席倡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他们手里变质为“官僚资本专政”——本应对反动派、坏人实行的专政，如今却反过来用在人民群众头上；本应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工具，反沦为压制人民正当诉求的铁拳。这正是修正主义路线在国家治理上的恶果。



修正主义路线的欺骗与群众路线的出路

江油事件揭示出，当权者奉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如何在意识形态上麻醉人民、在现实中压制群众。自改革开放以来，主流话语抛弃了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鼓吹所谓“告别革命”“唯经济论”，宣扬一夜暴富、个人发财的梦想，同时极力淡化阶级概念，妖魔化群众运动 and 大规模集体行动。中所说，正是这一套修正主义话术：用娱乐消费、明星八卦来转移视线，用民族主义和所谓盛世图景来营造幻觉，让人民“当牛做马、当奴仆”却不觉醒。在江油事件前，中国舆论场上更多看到的是对社会矛盾的冷漠乃至犬儒，人们仿佛麻木于底层疾苦，不再相信集体斗争的力量。然而江油人民以实际行动打破了沉默，证明毛主席那句“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依然是真理。

网上有评论感叹：“100年前的名言今天依旧有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江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可见，修正主义试图塑造的“太平盛世”神话正在破灭，阶级斗争的现实以新的形式凸显出来。值得注意的是，江油事件中群众的政治觉悟也在斗争中迅速提高。他们从单纯要求惩治校园暴力，逐渐喊出“还我民主”的口号。当局越是高压镇压，群众越认识到缺乏民主监督和组织力量才是问题根源之一。有民众痛斥：“这就是盛世吗？不过是老爷们的盛世罢了……”一语道破当今社会的本质——所谓“盛世”只是权贵阶层的盛宴，普通人民却饱受压迫。另一则评论将江油抗议同中东一些国家的小事件引发大抗争相提并论，认为这是极权统治下民众普遍痛感被欺压的信号，不可等闲视之。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并非不懂政治，而是在修正主义宣传长期压制下缺乏表达渠道。一旦事件触发，社会积累的不满就会以惊人的方式爆发。这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终将成为决定社会走向的力量。毛泽东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江油事件表明，当修正主义企图蒙蔽群众的双眼时，现实的苦难教育了群众。人民开始重新认识到团结斗争的重要性，这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重建群众组织：解决深层矛盾的毛主义道路

江油事件发人深省：一个欺凌案只是导火索，更深层的社会矛盾才是这场群众运动的燃料。在当前体制下，各种易燃的社会不满层出不穷：经济放缓、失业增加、房价高企、腐败滋生、贫富悬殊……据统计，2025年上半年全国平均每日发生14起抗议，比前一年几乎翻倍。当局或许能用武力一时平息江油的示威，但正如星星之火能够燎原，一个地方的怒火熄灭了，新的火种又会在别处点燃。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本身出了问题：修正主义路线让中国滑向权贵资本主义，人民日益感觉被欺压和剥夺，在政治上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要真正解决这些深层矛盾，唯有彻底抛弃修正主义路线，重走毛主席指引的群众路线。

首先，必须重建独立的群众组织。江油事件中，如果有真正代表工人、学生、市民利益的独立工会、学生会或社区群众组织，那么群众诉求就不至于完全被官方渠道漠视、只能通过上街喊冤来表达。毛泽东认为“组织起来”是人民走向胜利的关键。而修正主义者正是深知这一点，才会严禁任何独立的工人组织和群众自治团体。因此，我们呼吁广大人民建立和参与真正属于自己的基层组织，从工厂、学校到社区，形成跨地区的群众大联合。这些组织应当敢于监督公权、维护公共利益，成为联系党和政府与群众的桥梁纽带，而非如今官办组织那种摆设。没有群众自己的组织，人民民主只能是句空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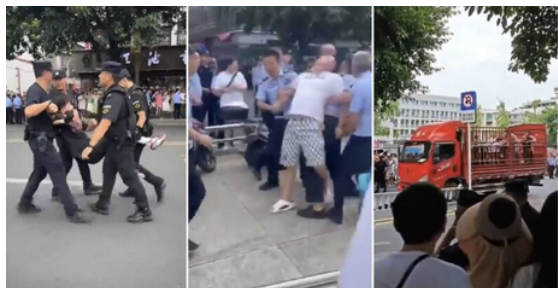
其次，必须重申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告诫全党：“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共产党人要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今天，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重新回到这一根本政治路线，以群众的疾苦为忧、以群众的利益为先。具体来说，执政者要倾听底层声音，及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类似江油这样的公共事件，应该发动群众参与调查和监督，坚决避免黑箱操作，让人民真正感受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意义。如果领导干部仍无视民意、飞扬跋扈，就应该在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下被撤换甚至绳之以法。正如毛主席所言：“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只有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政府决策才能避免脱离实际，社会治理才能得到多数人民的拥护。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要对祸国殃民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彻底清算。这不仅是思想口号，更需要实践行动。在政治上，要识破并批判那种宣扬阶级斗争熄灭、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肃清其在党内的影响。正如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党和国家被走资派把持。在经济上，要逐步纠正两极分化的政策导向，加强对资本的约束和对劳动群众的保障，防止权贵资本对公共利益的侵蚀。江油欺凌案之所以能发生、并且几乎被掩盖，正是因为地方权力与不法利益勾连、对弱势群众的呼声充耳不闻。这种现象绝非孤例，而是修正主义治下制度性弊病的缩影。如果不从体制上拔除滋生特权和腐败的土壤，此类阶级压迫的惨剧还会层出不穷。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伟大贡献。我们要继承这一思想，将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只有通过新的群众运动和思想启蒙，把广大工农群众重新动员起来，批判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捍卫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中国才有可能走出当前的困境。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警示说：

“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反观当下，人民民主荡然无存，反动特权分子却逍遥法外；所谓“专政机器”成了镇压人民的工具。对此现状，我们必须大声说

“不”！重建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意味着要把国家权力重新交到工人、农民和广大劳动人民手中，让人民来专政那些欺压人民的坏人和腐败分子，而不是相反。这场斗争将十分艰巨，但别无他途。正如网民所言：“江油人民确实有骨气”，他们已经给全国树立了榜样。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发扬这种骨气，唤起千百万群众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奋勇前进。



结语

江油事件的警示意义深远。它再次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当被压迫群众奋起抗争时，统治者的傲慢和谎言就被戳穿，社会真实的矛盾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紧要关头，表面的歌舞升平难掩底层民众的不满和绝望。江油数千群众的呐喊，代表了广大劳苦大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和对官僚特权的不屈抗争。这股蕴藏于人民中的革命潜能是任何高压手段都压不垮、封不住的。毛泽东早年指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就在于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力量并团结起来奋斗。我们坚信，只有重建群众组织、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算修正主义路线，才能把这种零散的自发抗争提升为有组织的自觉运动，才能真正解决横亘在中国社会的深层阶级矛盾。这意味着，要让人民重新成为国家的主人，把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腐败分子和走资派拉下马来；要恢复和发扬社会主义时期的优良传统，如群众批评监督、

“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要在政治上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在经济上保障劳动者的平等权利和共同富裕。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摆脱资本和官僚压迫的桎梏，迎来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新天地。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背叛革命宗旨的修正主义路线都是死路一条；而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江油事件中觉醒的群众不畏强权、奋起抗争的战斗精神，正是这一生命力的生动写照。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紧密团结工农兵学商，凝聚每一个正义的声音，汇聚每一股革命的力量。继续革命，反修斗争，就在当下！江油的怒火不会白白燃烧，它将点亮更多人心渴望变革的火炬。只有沿着群众路线前进，才能赢得人民民主的新胜利；只有打倒一切阻碍人民解放的修正主义势力，才能迎来真正没有欺凌和压迫的新社会！

对中国不是修正主义这一视频的回应

同志们，最近的一个视频里，有一个人声称中国不是修正主义，我们决定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并且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理清理论，就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的实践，这点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搞明白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搞明白什么是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就是在工人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否认，这个概念最先被用来描述欧根杜林和伯恩斯坦，这二位都在试图否认阶级斗争，否认国家是阶级专政的机关，反对作为阶级斗争总和的国内的内战。

今天在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所谓的“左派”常常会念叨这样一句话“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修正主义。”一些人甚至披着“左派”的外衣，鼓吹中国是什么“世界社会主义的最后堡垒”，并借此来麻痹群众的斗志，掩盖无产阶级所处的苦难现实。

视频博主提出：“中国不是修正主义，因为它依然承认阶级斗争，依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这就是典型的偷换概念。

承认阶级斗争≠真正实行阶级斗争。

中国今天的统治集团天天喊“阶级斗争熄灭了”，“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而在实际政策中却是保护资本、镇压工人罢工、鼓励私有企业。试问：这种“阶级斗争”到底斗的是谁？斗的不是资本家，而是斗工人、斗维权者、斗左派！列宁同志告诉我们，一个人只承认阶级斗争，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还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在这个期间，就必然会存在两个阶级，反映到上层建筑里就是两条路线。我们都知道，阶级斗争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古希腊时期的著作中，难道说古希腊人也是社会主义者吗？资产阶级在斗争封建地主阶级的时候，也承认阶级斗争，可是一到了自己胜利，就开始反对阶级斗争了，这难道是社会主义吗？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会一下子退出历史舞台，就像恩格斯同志所说，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很久远的，资产阶级争取到自己的分配形式走了几百年，无产阶级也要这样。这位先生又提出了一个怪议论，说反美国是阶级斗争，



我们在WAP那里也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中修反对美国，所以中修成了英雄。俄帝国主义反美国，所以俄帝国主义也是英雄。列宁同志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点小金毛先生是很明白的。可是他不能理解两种政治，一种是剥削者的政治，一种是被剥削者的政治。剥削者的政治是瓜分世界，被剥削者的政治是推翻剥削者。中修和美帝之间的政治就在这里，他们是要瓜分世界，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但凡看到世界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然后论及苏修的问题，苏修的三和一少，和平过渡是纲，别的都是目，一定的形式被一定的内容决定，这难道不是公认的吗？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难道不是因为赫鲁晓夫复辟了资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实行工人自治所导致的吗？谈及勃列日涅夫，他甚至都没有停下对美国的对抗，勃列日涅夫在世界各地张牙舞爪，和今天的习近平一样，难道勃列日涅夫就是马列主义者了吗？可是他在国内搞新经济体制，发达社会主义，给革命者带上手铐脚镣。

把“市场调节+私营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正常阶段”。视频里面说，允许市场存在、允许私营存在，不等于修正主义。同志们，这正是赫鲁晓夫当年说过的话，赫鲁晓夫搞“全人民国家”“全民党”，允许资本在农村复活，结果苏联滑向了资本主义复辟。今天中国全面鼓励私有资本、保护亿万富豪，甚至把他们送进“政协”，难道这不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游轮与潜艇”的比喻荒唐至极。

他说中国像一艘游轮，底下是潜艇工人。这比喻看似新奇，实则掩盖事实：在这艘所谓的“游轮”上，工人阶级根本不是乘客，而是被关在底舱的奴隶。整个航行的掌舵人，是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他把剥削说成“同舟共济”，这完全就是对工人阶级的嘲弄。这里，小金毛先生也不能够理解国家的意义，他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调和的机关，好个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国家是一定的阶级压迫阶级的机关，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会消灭，因为没有阶级可以镇压了。那在这个时候，游轮和潜艇在哪里呢？按照小金毛先生的论点，国家不应该存在，哪怕是存在了也是不可持续的。

污蔑工人阶级“不会斗争”。

小金毛甚至说外卖小哥、工厂妹不会团结革命者。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轻蔑论调。而事实就是，外卖工人正在自发组建工会，工厂工人不断罢工抗议，农民工多次集体维权。问题不是工人不斗争，而是工人的斗争被资本家与政府镇压，被媒体封锁。博主这根本就是在为压迫者辩护。

现实中国：修正主义的铁证

让我们拿出事实：

经济领域：资本横行。

马克思同志指出：“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后者只是在化学工业上才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也就是说，一定的社会要从一定的生产出发，从一定的人类生活出发。而在中国今天存在几乎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富豪榜上的资本家身家动辄千亿，工人月薪不过三千。“国进民退”是假象，实际上是国企官僚化、资本化，把国有资产当作官僚资本的工具。地方政府充当资本掠夺机器，强拆、卖地、血汗工厂，哪里还有“社会主义公有制”？

政治领域：无产阶级专政荡然无存。

工人罢工被抓捕，左翼青年下工厂被消声打压。人大政协早已成了资产阶级的俱乐部，富豪进政协，工人出牢狱。“共同富裕”成了口号，实质却是继续维护贫富差距。



意识形态领域：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化。

学校里讲的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主流宣传充满消费主义、民族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被稀释成无害的符号。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被污名化、边缘化。我想问问这难道不是修正主义？难道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孔老二的思想被大肆宣扬，毛泽东思想做了孔老二的俘虏，好个死人抓住活人啊！

历史的镜子：赫鲁晓夫与今天的相似

赫鲁晓夫当年就是用“还在搞社会主义，还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偷偷推行资本复辟。毛主席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挂着红旗，反动最凶。”

今天中国的修正主义比苏联更狡猾：

它一边高喊“人民至上”，一边血汗压榨；一边打着

“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一边把亿万富豪捧上神坛；一边挂着红旗，一边干着黑活。这不就是毛主席说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吗？



关于真理报：

我们是中国的一个马列毛主义组织，于2024年7月4日在浙江杭州成立，我们的目标就是打倒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组织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我们的官网：

<https://rcpconline.com/>

我们的纸飞机频道：

<https://t.me/CPCMarxismLeninism>

有意向者可通过官网来申请加入我们（一旦审核通过，便会成为我们的成员）或者订阅我们的杂志

投稿邮箱：cpcmlofficial@gmail.com

联系邮箱：CPCMLOfficial@proton.me

我们的立场：

小金毛视频的危害，不在于他个人，而在于他代表了一种思潮：让工人阶级放下武器，相信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我们必须告诉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复辟是真实存在的，不承认就会被奴役。修正主义就是阶级敌人最狡猾的面孔，必须揭露到底。工人阶级只有自觉组织起来，发动人民战争，才能打碎资产阶级专政，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结语：送给小金毛的一句话

你的视频也许能迷惑一时，但同时它也点燃了新的火种：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思考和追问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们感谢你的挑衅，因为你让真正的革命者有机会站出来，用实践和斗争告诉群众：中国的道路已经背叛了无产阶级，我们要另辟蹊径，重走革命之路。

这就是对“为什么中国不是修正主义”的最明确回答：中国正是当代最大的修正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掩体修正主义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掩体，工人阶级必将把它掀翻在地，重新建立属于自己的新中国，这就是我们给你的真理。



新秘鲁 – 种族灭绝者迪娜·博卢阿尔特为武装部队、国家警察和辅助部队成员正式制定特赦法

人民之火



种族灭绝者迪娜·博卢阿尔特的政府正式制定了一部特赦法，赦免武装部队、国家警察（PNP）和“自卫委员会”（种族灭绝武装部队的辅助部队）成员在反人类罪方面的责任。

这部特赦法从头到尾反映了秘鲁旧国家的本质和性质，撕下了其在反对人民战争中所谓“尊重人权”的伪装。人民战争自1980年5月17日开始，尽管经历了复杂艰难的局势，依然持续下去，因为人民战争不可能被消灭，党的生命哪怕片刻也不能中断。只要还有一个共产党员存在，他或她就能够、也必须重新再来。这就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冈萨罗思想的真理。那些否认它的人心怀鬼胎。

秘鲁共产党揭露的“由美帝国主义指导的秘鲁国家反革命战争的种族灭绝性质”（所谓“低烈度战争”对抗人民战争）再次被这部特赦法所证明。这个由迪娜·博卢阿尔特领导的法西斯、种族灭绝、卖国政府，将特赦给予种族灭绝的军队、警察和辅助部队（“自卫委员会”等）。

秘鲁反动派与帝国主义再也不能用所谓的“宪法与法律体系”、“民主合法性”、“尊重人权”等谎言来欺骗群众，在他们对人民战争的“低烈度战争”中，假面已彻底撕裂。

再次证明，对人民来说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正义。真正的正义只能通过革命暴力，通过人民战争来实现。只有人民保卫人民并伸张正义；只有通过人民战争，人民才能获得正义并惩罚所有对他们犯下罪行的人。

正如贡萨罗主席所说：

“人权（HR）：在秘鲁，宪法承认的第一项权利是对人的尊重，包括葬身之地的权利。我们也签署了国际公约，但没有一条得到落实。藤森说要执行它们，但我们每天看到的是什么？万人坑、失踪、囚犯、种族灭绝，以及对首都街头一切抗议游行的镇压。罢工权呢？言论自由呢？驱逐是每日都在发生，等等。我们正在经历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权利与现实之间最暴力的矛盾。谁要是说‘我们将依法对付颠覆’，正如贝朗德政府所说的那样，种族灭绝、不受惩罚的谋杀、强奸等等仍在继续。此外，秘鲁并不以尊重人权著称，而这正是美帝国主义所针对的问题。它决心向被压迫国家兜售这一信息，显然是其帝国主义欺骗和继续压迫剥削、发动反叛乱战争的一部分；这完全是胡说。”（参见秘共中委1992年二中全会文件）

关于上述问题，我们分享秘鲁《RPP Noticias》今天发表的一篇文章：

美洲人权委员会：特赦法与人权条约不相容，不应适用
作者：塞巴斯蒂安·阿科斯塔

2025年8月13日 晚上11点

美洲人权委员会代表安德烈亚·波查克表示，迪娜·博卢阿尔特颁布这部法律，是对几十年来寻求正义的受害者的冒犯。她还呼吁谨慎，以确保美洲人权体系得到尊重。波查克指出，博卢阿尔特政府制定的特赦法与秘鲁签署的人权条约不相容，表现出对美洲人权体系的公然蔑视。

“在我看来，美洲人权法院也认为这部法律与秘鲁签署的人权条约不相容。因此，秘鲁法官有义务审查一部法律是否合宪或符合国际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这部法律既不合宪，也不符合国际规范，因此法官不应适用它。”她说。

“条约是签了就要履行的。”

波查克还指出，秘鲁国家是自愿加入美洲人权体系的，而现当局制定这部法律的立场，违反了美洲人权法院2001年的裁决，即特赦法与委员会不相容，不能生效。

“秘鲁多年来自愿遵守其签署的人权条约。条约签署就是为了履行，因此秘鲁法官必须确保条约得到遵守，在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这部法律不应被适用。”她强调。

“各国必须接受国际监督，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受害者，为了人民享有人权的权利。这是各国以主权方式做出的选择。我们希望秘鲁回归理性，公开且尊重地遵守美洲人权体系的决定。”

本周三颁布特赦法

尽管司法部门和检察机关提出批评，迪娜·博卢阿尔特仍在周三签署立法，将特赦授予1980年至2000年间参与反恐斗争的武装部队、国家警察和自卫委员会成员。

行政当局宣布，将批准国会于7月9日通过的这项立法。总统甚至否决了美洲人权法院要求立即中止该法的决议

来源：“人民之火”网站

<https://lesfpcn.wordpress.com/2025/08/22/17082025-3/>

共产主义原理（第三部分）

德国
F·恩格斯

第十一个问题：工业革命和社会划分为资产者与无产者首先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第一，由于在世界各国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旧的工场手工业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所有那些迄今或多或少置身于历史发展之外、工业迄今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的半野蛮国家，随之也就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置于死地。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革命。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因此，如果现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获得解放，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这种革命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

第二，凡是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地方，工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及其财富和势力最大限度地发展起来，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阶级。结果，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级都取得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统治阶级——贵族、行会师傅和代表他们的专制王朝。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出卖领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消灭了特权贵族、土地贵族的势力。资产阶级取消了所有行会，废除了手工业者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摧毁了行会师傅的势力。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代替它们；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什么也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只是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才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从而资本家，资产者成为社会上的第一阶级。但是，自由竞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资产阶级这样消灭了贵族和行会师傅的社会势力以后，也就消灭了他们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在社会上上升为第一阶级以后，它也就在政治上宣布自己是第一阶级。它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做到这一点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的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这种制度在欧洲各国采取立宪君主制的形式。在这种立宪君主制的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这些资产者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利，选出资产者政府。

第三，工业革命到处都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资产者越发财，无产者的人数也就越多。因为只有资本才能使无产者找到工作，而资本只有在使用劳动的时候才能增加，所以无产阶级的增加和资本的增加是完全同步的。同时，工业革命使资产者和无产者都集中在最有利于发展工业的大城市里，广大群众聚集在一个地方，使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其次，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把工资压得越来越低，把它压到上面说过的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越来越不堪忍受了。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工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

第十二个问题：工业革命进一步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大工业创造了像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手段，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变得这样容易，这种大工业必然产生的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程度。大批资本家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到来了。工厂只好关门，厂主破产，工人挨饿。到处出现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过了一段时间，过剩的产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资提高，生意也渐渐地比以往更好起来。但这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很快又会生产出过多的商品，新的危机又会到来，这种新危机的过程和前次危机完全相同。因此，从本世纪初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每一次它都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



导师语录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的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话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话

